

任嵊县流动宣传队、特委妇委会队员，余姚县妇委会书记，绍兴县委交通员，三五支队政工队队员，姚慈县委常委、妇女部长，宁西古林区委副书记，金萧地区区委委员，诸北区委书记兼民运队长。北撤后，历任三师文工团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妇女队支部书记、妇女大队和妇女干部学校休养队政治指导员等职。1949年随部队南下，历任杭州丝织业工会组织科长，市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女工部部长，市护士学校政治室主任，省总工会女工部、劳动部部长，胜利丝织厂副厂长、杭州丝绸印染厂副厂长等职。1978年12月离休，2000年9月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2010年11月在杭州逝世。

[8] 张光（1911—2003）：原名陈未冬，化名张春松，诸暨人。1938年4月，在陕北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当选为中共诸暨县委常委、代理书记，9月任中共诸暨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2月，任余姚特派员。1942年，任余上县委书记兼县长和余上自卫大队大队长。1945年10月，随军北撤后华东野战军一纵组织部组织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处处长、工业厅副厅长等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83年初底平反。从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位上离休。

[9] 叶伯善（1917— ）：曾化名金林、金一明，余姚人。余姚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到余姚县农民银行当练习生、职员。“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后又接触了进步书刊，接受了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组织了余姚商业人员工作队，任总务股长。1938年7月，在余姚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到金华三青团浙江支团部筹备处举办的训练班受训并入团。次年5月，在三青团余姚分团部任总务股长。1940年12月，叶伯善由中共绍属特委决定调任中共诸暨中心县委常委。1941年底任中共嵊西区特派员。1942年7月，任中共嵊西县工委书记。1943年5月后，调中共会稽地委、金萧地委做秘书工作。

1945年9月，叶伯善随军北撤。1945年11月至1964年12月，先后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工作，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干部部部长、九十四师副政委、军干部部副部长、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干部处处长等职。期间，参加了解放战争华东战场历次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二次、第五次战役。先后获华东野战军三级人民英雄奖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

旗勋章、国防部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12月，转业至交通部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1983年离休。

[10] 王平：即王文祥（1906—1945），原名高子清，又名高世恩、高仰上，化名王超平、王平、王耀章，绍兴人。出身于工商地主家庭。童年就读于斗门辨志小学，毕业后，入绍兴第五师范学校，不久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在校期间，参加了杭州党的外围组织反基督教青年大同盟。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两度被捕，因未暴露身份被释放。这年下半年，到萧山义桥镇创办平民夜校，在学生中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并成立党支部，自任书记。期间，着手做农民工作，发动农民打倒豪绅地主，并准备农民暴动，后被当局获悉，暴动未成。1928年下半年，离开萧山到杭州。1929年8月，任中共杭州中心市委委员，负责小学教师中党的工作。1930年4月，任中共杭州市行动委员会成员，并负责互济总会工作。接着，到各地开展工作，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同时到绍兴、萧山、余姚等地发展互济会工作。1930年9月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监禁在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秘密担任浙江陆军监狱特支宣传委员、支部书记职务，领导难友多次组织狱中对敌斗争。1937年12月，因病保外求医出狱。不久，奔走浙江各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1938年2月，王文祥出任中共浙江省工委委员。后赴宁波报馆任职，4月，主持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工作。5月，中共宁绍特委成立，出任委员，主管绍兴、余姚、慈溪一带工作。1939年1月，兼任宁绍特委组织部长。期间，曾到绍兴，为发展绍兴县的党组织，亲自到绍兴调查研究、制订发展计划。1940年1月，宁绍特委分为中共宁属特委和绍属特委。3月，任宁属特委书记。1941年1月，改任中共宁属特派员，积极领导其下属党组织坚持原地斗争，并配合浦东部队在浙东地区开展抗日活动。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后，8月，成立中共四明工委，9月，改为中共四明地委，担任四明工（地）委书记，积极领导上虞、嵊县、新昌等四明山周围各县党的工作。1943年3月，受浙东区党委委派到驻上虞的国民党八十九团张俊升部搞统战工作，并领导该部中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7月，在三北养病。1944年2月，又遭被捕，后获释。11月，浙东区党委杭甬沿线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城工委书记。此时，身体状况极差，但仍坚持

工作。1945年9月，区党委决定他去上海住院。12月28日，病逝于上海。

[11] 马青（1908—1989）：浙江绍兴吴融人。1930年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1937年赴延安。1938年带队来余姚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绍诸特委委员兼诸暨中心县委书记，金萧地委副书记、金萧支队诸北办事处主任，金萧地委特派员，中共浙东临委副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金华、绍兴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央粮食部副局长，江西省轻化工厅副厅长，江西省经委、计委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12] 朱之光（1918—）：原名朱孚若，余姚县左溪乡（今余姚市梨洲街道）龙坑村人。幼年就读于本村朱家祠堂、梁弄正蒙小学和县一小。1938年4月，通过招考参加国民党余姚县战时政治工作队。不久，参加海北政治工作队，到沦陷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下半年，在国民党余姚县自卫总队任中队政工指导员，秘密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任政工队第四区队队长，在四明山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4月，余姚沦陷后，朱之光在山区和姚北一带发动原政工队员和群众骨干积极分子，经中共余姚党组织同意，建立了浙东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任大队长。1942年5月，浙东军分会为开辟会稽根据地，决定浙东抗日武装组成南进支队，朱之光率部编入南进支队。6月，与南进支队挺进会稽，参加了南进支队在后，任中共姚虞（后改姚慈，姚南，南会稽地区的抗日斗争。10月，任姚南办事处主任。1943年1月后，任中共姚虞（后改姚慈，姚南，南山）县委委员、南山总办事处副主任、主任。1943年秋，任姚虞秋收委员会（半政权性质咨询机构）副主任。秋收期间，发动左溪、梁弄、让贤等乡的3000多群众去城南南雷、梨州两乡，一夜之间夺回了被日伪掠夺去的粮食。在浙东第二次反顽斗争期间，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不断扩大武装，为主力部队保存粮食、输送后备力量和负责供应军需物资。1944年1月，任姚南县办主任。1945年3月，任南山县县长。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朱之光根据组织决定留下坚持斗争，任南山县（后改姚虞县）负责人并兼顾余上县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挫败了敌人多次“围剿”，并积极恢复党组织，曾亲自到虞东地区领导党的恢复工作。在得到恢复武装斗争的指示以后，1946年12月4日，领导了天华缴枪。1947年1月后，任中共四明工委委

员、副书记。5月，兼任中共姚虞县工委书记，积极参加了四明武装的重建工作。后又任四明特派员办公处主任，负责筹取经费与物资。1948年，任中共四明工委财经后勤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3月，调任浙东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4月，任中共会稽临工委副书记，参与领导了会稽地区迎接大军南下接管城市的斗争。5月7日，绍兴解放，随浙东人民解放军主力入城，参加了县城的接管工作，主要负责处理绍兴的财政事务。至5月下旬，跟随人民解放军东进。

宁波解放后，朱之光任宁波军管会财经副部长，1949年10月，任宁波专员公署第一副专员。1952年11月，任专员。与此同时，在党内任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常委、专署党组副书记、书记等主要职务，还兼任中共宁波地区城市工作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等职务，领导宁波地区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6年6月，调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64年9月，兼任省政协副主席。“文革”中受冲击。1981年5月至198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离休。离休后，仍热心党史工作和老区经济工作，著有《在四明山上》。

[13] 余震：应为俞震（1917—2014），原名俞根芳，余姚县临山镇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余姚县（工）委委员，中共姚南（南山）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外语教授会副主任、主任，南京军事学院史料研究处处长，浙江省丽水军分区副政委、中共丽水地委常委等职。

[14] 袁啸：即袁啸吟（1922—），上虞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余姚、绍兴一带从事党的群众工作，曾任上虞战时政治工作队区队长、浙东游击大队党代表特别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市工业局局长、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省外贸易局局长、党组书记，省贸促会会长等职。

[15] 戚善康（1908—1942）：余姚泗门后塘河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42年在泗门谢家路桥西牺牲，生前为浙东抗日游击大队队员兼分队长。

[16] 童淑贞为余姚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本文整理时间为1961年。

解读

叶瑞康（1914—？），余姚浒山（今属慈溪市）上叶家人。1939年2月，参加余姚县政工队。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政工队支部委员。1940年2月，任二区队长，秋，政工队改组，转任战时社会服务团总团部干事长，兼任中共余姚大云区区委书记。皖南事变后，调到诸暨，任中共诸暨县委委员兼北区区委书记。8月，调任中共诸西南区特派员。1942年5月诸暨沦陷后，任中共路西县工委书记。1943年5月调到嵊县，任中共嵊西特派干事。1944年10月，中共嵊西县委成立后，任委员、组织部长。期间，在嵊西贯彻党的隐蔽精干政策，以国民党嵊县第一联乡总队情报组人员的合法身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情报搜集工作。1945年9月，奉命随金萧支队北撤，任金萧支队组织干事。建国后调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任办公室主任。1954年8月党群与省委办公厅两个机关党委合并成立党群机关党委，叶瑞康任书记。

本文是叶瑞康同志的回忆记录，时间：1961年，地点：浙江省委组织部叶瑞康办公室，记录整理：童淑贞（余姚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叶瑞康的回忆包括党组织系统情况、政工队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政治经济斗争情况三个部分，重点是第三部分中的三次经济斗争：四门棉花斗争、姚北平巢斗争和陆埠抢米斗争。

抗战开始之后，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余姚的党组织也迅速得到恢复，中共余姚县委在城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关心农民、盐民、山民等基本群众的切身利益，多次领导群众与地主、恶霸、茶商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剥削经济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还在斗争中涌现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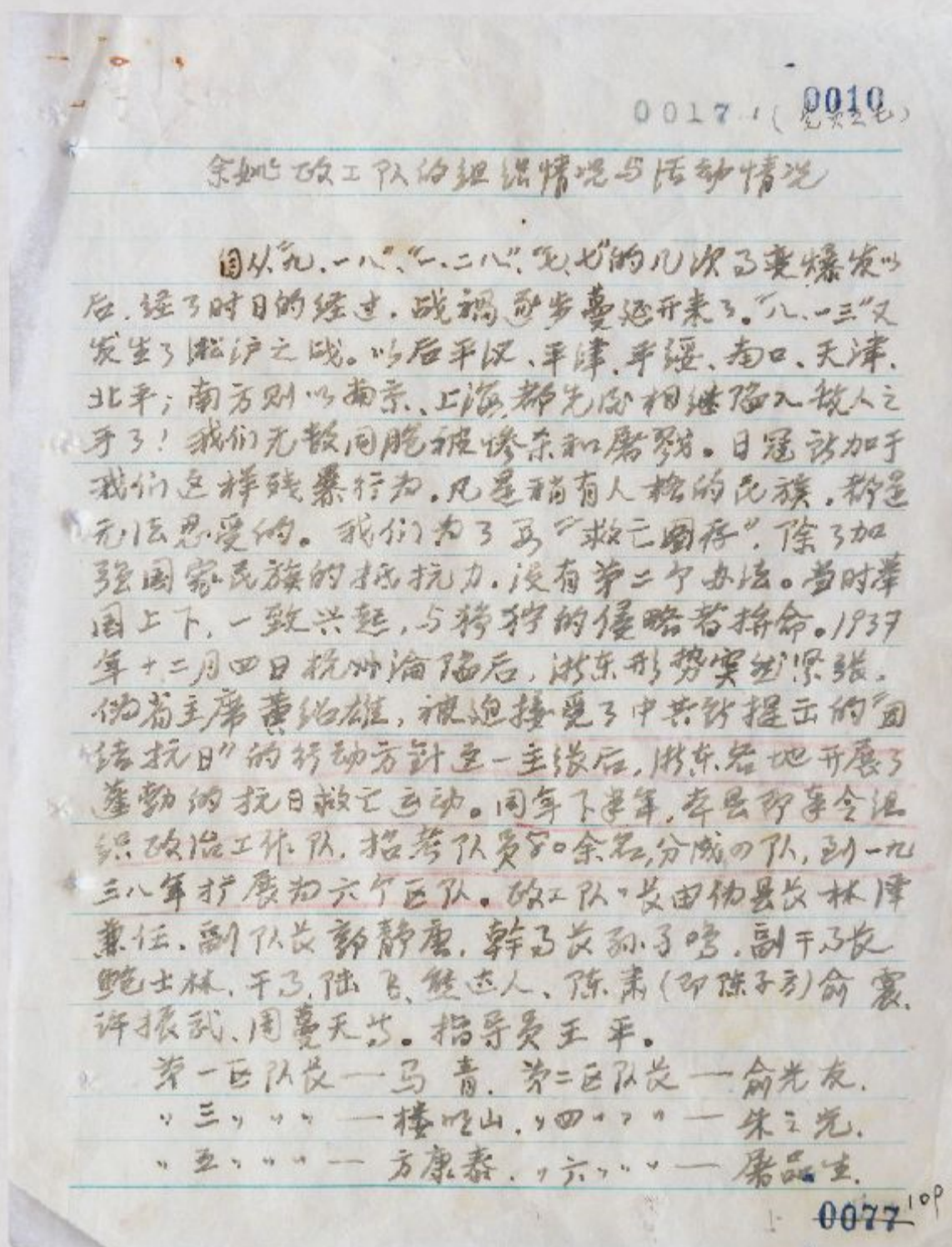
在现存各类有关抗战时期的党史资料中，比较多地反映的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内容，介绍经济斗争方面的史料不是很多，本文则侧重地反映了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开展经济斗争的情况，因此尤为珍贵。

叶瑞康同志的回忆，准确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余姚党组织在领导开展军事政治斗争同时开展经济斗争的情况，三者相互呼应，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

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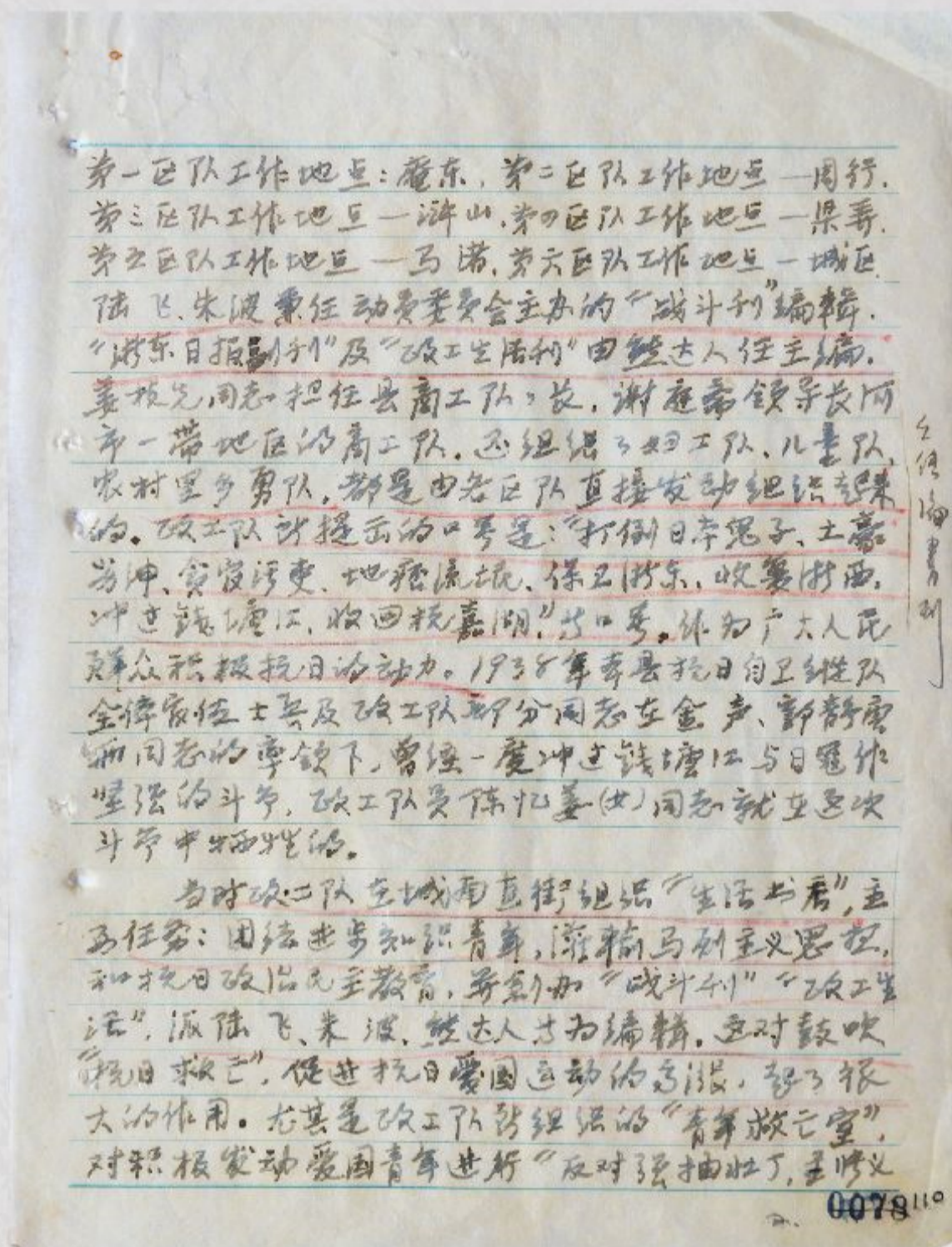
叶瑞康对三件经济斗争的回忆有详有略，如泗门棉花斗争和平巢斗争的经过和相关环节，比较翔实，回忆中引用的农民歌谣，把农民不堪沉重租钱的境况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整个回忆，既有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有对工作方法上不足之处检讨。

二、孙子鸣：余姚政工队的组织情况与活动情况



第一页

原件尺寸：167×215mm
 档案编号：241-1-38-10-1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第二页

原件尺寸：167×215mm
 档案编号：241-1-38-10-2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务斗争，反对奸商走私”与群众斗争，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更提出“二五减租”，“改善农民生活”，提出抗日情绪”的任务。进一步发动茶农、田农，广泛请歌谣，动。一系列的斗争，都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只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乡镇保长极加仇视。

余姚改工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了余姚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同时构成了余姚以及整个浙东地区的无产阶级与青年知识分子革命阵线的联系。当时改工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了革命青年的潜力，不但工作积极，而且学习也很抓紧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到月底集中干部总结、检查一次。工作中有什么心得？有什么缺点与困难？有困难怎样来克服？有什么缺点如何来纠正？同志们就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进工作。同志们对工作的信心很足，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她始终有一个叫过苦，而且都能够做到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如有困难，立刻代其解决。豆场都站得很稳。甚至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不屈的斗争。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民主精神，并揭发敌人的阴谋险恶计。采用割田、歌谣等形式进行。如发现有多镇保长、土豪劣绅，以及地痞流氓迫害贫苦农民，或强拉壮丁等不法行为，立刻报告。

0079 11

第三页

原件尺寸：167×215mm
档案编号：241-1-38-10-3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平办。同志们认为群众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所以群众，尤其是贫苦的农民群众，称改工队为“公正队”，叫改工队同志为“包青天”。无论生疏，在山区，陈东地主家，土豪劣绅，反动派外，没有一个不称颂改工队的。真是有口皆碑。因此，即引起反动统治的仇恨与忌视。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

余姚改工队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极艰巨的。我们在第一阶段工作中，曾经受过倪永强多次打击。当时队伍中情况很复杂，内中有一小部分队员是倪永强派进来的密探，分化同志的意图。这些密探，分崩力加，无所不为。可是终于被我们发觉了。立刻把他们情况报告，男招进来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进来，工作就开展。特务分子倪永强为了派小特务进来作累，不成就怀恨在心，就用更毒辣的手段来破坏：一方面向省方密告，说余姚改工队是共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叫小特务们到处造谣中伤，引起人家注意。当时被告的人有七十二人，凡与改工队有关系的人士没有一个幸免。反动派一面密令保长林屏查林屏曾经找我谈过好几次，马我把改工队的内部秘密告诉他，我始终没有说真话，只说这都是倪永强在捣鬼，绝口不提。最后改

112

第四页

原件尺寸：167×215mm
档案编号：241-1-38-10-4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迫令改组。郭精原同志被特务曾国垣捕送上饶集中营。改工队就此瓦解。

孙了鸣 1959年11月20日

113
0061

第五页

原件尺寸：167×215mm
档案编号：241-1-38-10-5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余的县组织：各新组织名单

孙了鸣

前 列	姓 名	政治倾向	职业/组织	备 注
县 长	林 涛	国民党		松溪：国民党县党部主任
副 长	郭 德	共产党		1952年11月20日以前在松溪
科 长	徐 鸣	国民党政府	松溪：松溪国民党	
副 科 长	魏 士 林		杭州	
科 员	王 飞	共产党	松溪：松溪国民党	
科 员	史 述 久			烈士 松溪：松溪国民党
科 员	何 震		南京军事学院	
科 员	陈 清		浙江法院	
科 员	汪 甲			

区 队	区 长	政治倾向	备 注
第一区	王 春 昭	国民党	江西
二 区	俞 瑞 昭	国民党	松溪：松溪国民党
三 区	魏 明 昭	共产党	烈士 松溪：松溪国民党
四 区	朱 正 昭	共产党	松溪：松溪国民党
五 区	方 展 昭	国民党	
六 区	唐 品 昭	共产党	浙江军区

114
0062

第六页

原件尺寸：167×215mm
档案编号：241-1-38-10-6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释文

余姚政工队的组织情况与活动情况

自从“九·一八”^[1]、“一·二八”^[2]、“七·七”^[3]的几次事变爆发以后，经了时日的经过，战祸逐步蔓延开来了。“八、一三”^[4]又发生了淞沪之战。以后平汉、平津、平绥、南口、天津、北平；南方则以南京、上海都先后相继陷入敌人之手了！我们无数同胞被惨杀和屠戮。日寇所加于我们这样残暴行为，凡是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为了要“救亡图存”，除了加强国家民族的抵抗力，没有第二个办法。当时举国上下，一致兴起，与狰狞的侵略者拼命。1937年十二月四日杭州沦陷后，浙东形势突然紧张，伪省主席黄绍雄^[5]，被迫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团结抗日”的行动方针这一主张后，浙东各地开展了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下半年，本县即奉令组织政治工作队，招考队员80余名，分成四队，到一九三八年扩展为六个区队。政工队队长由伪县长林泽兼任，副队长郭静唐，干事长孙子鸣，付干事长鲍士林，干事陆飞^[6]、熊达人^[7]、陈肃（即陈子方）^[8]、俞震、许振武^[9]，周蔓天^[10]等。指导员王平。

第一区队长——马青 第二区队长——俞光友^[11]

第三区队长——楼明山 第四区队长——朱之光

第五区队长——方康泰 第六区队长——屠品生

第一区队工作地点——庵东 第二区队工作地点——周行

第三区队工作地点——浒山 第四区队工作地点——梁弄

第五区队工作地点——马渚 第六区队工作地点——城区

陆飞、朱波兼任动员委员会主办的“战斗刊”编辑，“浙东日报副刊”及“政工生活刊”由熊达人任主编。（作者页右自注：“宣传编书刊。”）姜枝先同志担任县商工队队长。还组织了妇工队、儿童队、农村里乡勇队，都是由各区队直接发动组织起来的。政工队所提出的口号是：“打到日本鬼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痞流氓，保卫浙东，收复浙西，冲过钱塘江，收回杭嘉湖，”等口号，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日的动力。1938年本县抗日自卫纵队全体官佐士兵及政工队部分同志在金声、郭静唐两同志的率领下，曾经一度冲过钱塘江与日寇作坚强的斗争，政工队员陈忆姜（女）同志就在这次斗争中牺牲的。

当时政工队在城南直街组织“生活书店”，主要任务：团结进步知识青年，灌输马列主义思想，和抗日政治民主教育，并创办“战斗刊”、“政工生活”，派陆飞、朱波、熊达人等为编辑，这对鼓吹“抗日救亡”，促进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政工队新组织的“青年救亡室”[#]，对积极发动爱国青年进行“反对强抽壮丁，主张义务应征；反对奸商走私”等群众斗争，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更提出“二五减租”、“改善农民生活”、“提高抗日情绪”的任务。进一步发动茶农、田农、盐民请愿运动。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只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乡镇保长极为仇视。

余姚政工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了余姚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培养出大批革命干部，同时构成了余姚以及整个浙东地区的无产阶级与青年知识分子革命间的联系。当时政工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很多革命青年的潜力，不但工作积极，而且学习也很抓紧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到月终集中在队本部总结、检查一次，工作中有什么心得？有什么缺点与困难？有困难怎样来顺服？有缺点应如何来纠正？同志们就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进工作。同志们对工作的信心很高。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始终没有一个叫过苦，而且都做到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如有困难，立刻代其解决。立场都站得很稳，甚至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不屈的斗争。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宣扬民主精神，并揭发敌人的罪恶、阴谋诡计，采用剧团、歌咏等形式进行的。如有发现有乡镇保长、土豪劣绅、以及地痞流氓迫害贫苦农民，或强拉壮丁等不法行为，立刻报县严办，同志们认为群众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所以群众，尤其是贫苦的农民群众，称政工队为“公正队”，叫政工队同志为“包青天”。无论在盐区、在稻区、在山区、除出地主实农、土豪劣绅、反动派外，没有一个不称颂政工队的好，真是有口皆碑。因此，而引起反动统治的仇恨与忌视，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

余姚政工队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很艰巨的。我们在第一阶段工作中，曾经受过倪永强多次打击，当时队员中情形很复杂，内中有一小部分队员是倪永强派进来窃取情报、分化同志间的情感。造谣破坏、分散力量，无所不为。可是终于被我们发觉了，立刻把他们清洗出去。另招进步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进来，工作就此展开。（作者页右自注：“内部斗争情况”。）。特务份子倪永强

为了派小特务进来作祟不成功，怀恨在心，就用更毒辣的手段来破坏：一面向省方告密，说余姚政工队是共产党的组织，另一面叫小特务们到处造谣中伤，引起人家注意。当时被告的人有七十二人，凡与政工队有关系的人士没有一个幸免。反动派一再密令伪县长林泽查复。林泽曾经找我谈话好几次，要我把政工队的向内部秘密告诉他。我始终没有说出真情，只说这都是倪永强在捣鬼，绝无此事。最后政工队迫令改组，郭静堂同志被特务曾国垣捕送上饶集中营，政工队就此瓦解。

孙子鸣（章） 1959年11月20日

余姚县政工队本部组织名单：

职别	姓名	政治情况	现在工作地点	备注
兼队长	林泽	伪县长		根据“组织法”规定，队长由属地县长兼。
副队长	郭静唐	共产党员		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不治病逝
干事长	孙子鸣	余姚县政协社会人士学习小组长	现在梨洲文献馆	
副干事长	鲍士林		杭州	
干事	陆飞	共产党员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	
干事	熊达人	共产党员		烈士，牺牲于皖南苏村
干事	俞震	共产党员	南京军事学院	
干事	陈肃	共产党员	浙江法院	
指导员	王平	共产党员		

区队组织名单：

区队	区队长	活动地点	备注
第一区队	马青同志	庵东	江西省
第二区队	俞光友同志	周巷	共产党员，现在北京中央直属党校
第三区队	楼明山同志	浒山	共产党员，烈士，牺牲于舟山小展岭
第四区队	朱之光同志	梁弄	共产党员，现在浙江省委统战部
第五区队	方康泰同志	马渚	
第六区队	屠品生同志	城区	共产党员，浙江军区

余姚县政工队队员名单：

姓名	政治情况	现在工作地点	备注	姓名	政治情况	现在工作地点	备注
许振武	共产党员		烈士	史浩君		上海卫生工作	有些问题
陶园	叛徒			叶素英		浙江余姚商业	脱过党
张中民	共产党员		烈士	马青		江西省	
宋婉清			病亡	宋婉玉		上海居民	有些问题
马步芳	共产党员		已故	俞志英	共产党员	江西省	
陈和顺			烈士	庄文君	共产党员	浙江省工作	
陈忆姜			烈士	宋世斌	共产党员	上海解放日报	
张志云	共产党员		烈士	胡祚慈	共产党员	上海水产部	
张玉英			病亡	潘成舟		上海	有些问题
陈大盛	共产党员		烈士	施连脚		杭州工作	有些问题
俞幼鹤	共产党员		烈士	史招荣	共产党员	浙江余姚人委	
戚善			病亡	翁承华			情况不明
周曼天	共产党员	福建军区		马志群		杭州	
陈庭鲤		26军		徐桂英		徐州	
袁莱周	共产党员	杭州		裘碧霞			情况不明
杨习彪		原杭州车站军代表		宋天民		上海	有些问题
唐敏鹿	共产党员	北京		许哲霞			情况不明
叶瑞康	共产党员	浙江省委组织部		史美清		浙江余姚工作	脱过党
杨小梅	共产党员	浙江交通厅		劳鹤年		杭州商业	
郑梅君		上海居民	有些问题	胡连太		据说在皖南	脱党
宋铮		天津居民	有些问题	沈和忠			情况不明
韩露雁		福建卫生工作	有些问题	周毓芳		浙江余姚工作	

余姚县政工队队员名单：

姓名	政治情况	现在工作地点	备注	姓名	政治情况	现在工作地点	备注
周静(敏)辉		杭州		黄秋水			
鲁也愚			情况不明	袁诚			
蔡复强	共产党员	宁波工作		何元康	共产党员	部队	
张志远			情况不明				
陈汉民		重庆					
陈汉耀		杭州					
许耀武		浙江余姚工作					
黄汉		上海					
郑俊民		余姚	有些问题				
黄亚奋	共产党员	浙江工作					
周立伟			情况不明				
邵耐安			情况不明				
章慷		杭州	出卖过党				
叶婉卿		汉口居民					
钱邦安	叛徒						
秦鲤	共产党员	江苏					
韩世坤	共产党员	陕西西安铁路局电务处					
杨钟辉							
陆维达							
黄庆荣							
胡杏棠							
孙礼清							

8、6、68=82+26=108人

[1] “九·一八”：史称“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制造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炮轰沈阳城，于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整个东北沦陷于日军之手。

[2] “一·二八”：史称“一二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月28日晚，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淞沪战争爆发。

[3] “七·七”：史称“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抗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予以还击的事件。当日夜间，驻北平（今北京）丰台日军谎称演习中“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拒绝后，即向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抗击。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11日，日本政府决定增兵，调关东军及驻朝鲜日军各一部进攻北平，调日本国内陆海军一部进攻天津。17日蒋介石表示应战。27日日军陷廊坊、宝珠寺等地。28日日军猛攻南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至30日，平津陷落。从此，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4] “八·一三”：史称“八一三事变”，也称“淞沪会战”、“淞沪抗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作战。1937年7月日军侵占平津后，以驻沪日海陆军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武装挑衅被击毙为借口，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中国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中国方便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9万余人参加会战，日军也逐次增兵，总兵力达9个师团22万余人。从23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均遭顽强抗击。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12日淞沪陷落。

[5]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广西容县人。辛亥革命时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曾任桂军模范营排长、讨陆（荣廷）西路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七

军国民党代表。1927年后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去香港，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旋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66年在文革风暴中自杀。

[6] 陆飞：即陆学斌（1913—1995），原名陆守怀，又名陆飞，余姚马家路人（现慈溪市）。以优异成绩考入绍兴第五中学讲习科，1931年7月讲习科第六届毕业生。毕业后到杭州市郊下菩萨小学教书。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读书会；1937年底，得悉老师马育儒已在姚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即回故里。受知于当时余姚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郭静唐，并共同筹组政工队任干事。余姚抗日自卫委员会成立，兼任该会政工干事。主编《战斗》周刊，并兼《浙东日报》编辑。这时他改名为陆飞。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国共产党余姚县委委员。在这一时期，他协助郭静唐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直到1940年8月，郭静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陆学斌被逼离开余姚至皖南，即随新四军挺进大别山。以后就一直在安徽地区工作。任皖江行署秘书长、无为县长、皖中地委常委、专员，军调小组中共代表、第三野战军总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南下干部大队政委、皖西军区四分区政委、中共皖西四地委书记。1959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到无为县检查工作，对该县工作中“左”的错误造成严重损失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是支持该县基层干部和群众解散了部分食堂。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也说了“争上游，要实事求是”，“大跃进违反客观规律，规律要发脾气”等话。1959年8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安徽“张陆反党集团”挂帅人物。1962年7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撤销了这个决议。1963年7月31日举行的中共安徽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陆学斌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又调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候补书记，新疆大学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第一副校长，新疆自治区文办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和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八大代表。

[7] 熊达人（1910—1941）：又名大嘉，杨大迦，余姚县柯义乡熊家街村（现属朗霞街道）人。1927年秋，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初三年级，次年春升入上海浦东中学。1930年7月，高中毕业，受聘至余姚县立第一小学任教，1935年秋，任泗门诚意小学教务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当年冬天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熊达人回到余姚，进入余姚县政工队，任队本部组织干事，党内任政工队支部书记和党团书记。1938年7月，任中共余姚县工委委员。1939年5月，任中共余姚县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1939年9月，任中共余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政工队队本部干事长。1940年夏，熊达人等人撤离余姚，来到皖南丁家山中共中央东南局，1940秋，任安徽省广德县委委员。1941年1月牺牲。

[8] 陈肃：即陈子方（1915—2005），原名大椿，曾用名陈肃，浙江余姚历山人。年幼时在村初级小学读书3年，因家境贫困失学，后进入通问学塾函授学校学习。1934年春，在镇海神远小学执教，暑假时赴沪进上海日报社任校对。不久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自会）。1935年，到京沪、沪杭甬铁路工作，这期间与“武自会”保持秘密单线联系。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奉命撤离抵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进安吴青年训练班学习。学习期满后，以浙江文化人回乡服务团的名义，到丽水、诸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秋回到余姚，由党组织分配担任余姚政工队队部干事，一个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城区特支书记。1939年2月，任政工队第三区队队长；同年7月，调任中共余姚中心县委委员、动员部长。1940年9月，调舟山，参加县工委，负责军事工作。1943年10月，任中共慈南中心区委委员、慈南区区长。

1950年4月，陈子方调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兼二科科长。1953年12月，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下放到杭州市百货公司任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5月，调任省内务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分管知青工作。1977年12月，调任省民政厅副厅长。1980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2005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

[9] 许振武（1919—1942）：余姚历山人。早年在康节小学读书，毕业后到上海工作，1936年，参加“救国会”。抗日爆发歇业回乡，参加抗日宣传工

作。1938年3月，参加余姚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先后担任干事、干事长，并兼任队刊《政工生活》编辑。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任中共余姚县政工队支部书记。1940年秋，政工队被迫解散。受党组织指派，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结业后，任连政治指导员。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的突围中被俘，押解至上饶集中营，后被编入“政治顽固队”第六中队。1942年，上饶集中营南移，6月7日，行至福建崇安赤石镇时，参加集体暴动，不幸壮烈牺牲。

[10] 周蔓天：应为周曼天（1922—），原名荣辉，余姚人。193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原福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等职。

[11] 俞光友：应为徐光友，即余先（1915—1984），原名徐光友，化名张克胜，余姚县潮界乡上徐家村人（今属慈溪）。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月至1945年1月，任中共余上县秘密系统特派员，中共姚城工委委员。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姚解放后，于1949年6月任中共余姚县委副书记。1951年进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毕业后留中共中央党校，任党史党建教研室领导工作。

解读

关于余姚政工队

余姚政工队是“余姚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简称。1938年2月，余姚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抗卫会”）成立，由县长林泽兼主任，吸收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县内进步人士、中间人物和士绅代表为副主任。3月，县政府和抗卫会组建余姚政工队，林泽兼队长，进步人士郭静唐为副队长。郭静唐是大革命时期余姚的群众领袖、共产党员，“四一二”后被国民党通缉，长期流亡上海，进行进步活动。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郭回到家乡，即被林泽聘请为县政府特务视察员、县抗卫会副主任委员兼政工组长，是余姚政工队的实际负责人。此后，中共宁绍特委王平、中共余姚县委书记陈小平决定，派陆飞、俞震等同志参与政工队的具体组建工作，以后还有经陕北公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与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派回余姚工作的熊达人、龚乐天、陈肃（陈子方）、楼明山、马青、唐敏鹿（唐伟）等同志，由党组织安排进入政工队，分别担任政工队早期的队本部干事和区队长，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政工队的领导。因此，余姚政工队自始至终都处于我党的实际控制之下。“抗战初期余姚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确实是由我党掌握和领导的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中共余姚县委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关于为抗战初期余姚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明确性质的批复》）

余姚政工队在党领导下，利用合法的组织，打着公开的旗号，在余姚的乡村、山区、盐场和城镇，通过举办时事讲座、识字班，组建歌咏队、业余剧团等多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第一，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动员群众参战支战，支援地方武装建设，第三，为保护群众权益，进行必要的斗争，第四，通过政工队开展统战工作，第五，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总之，余姚政工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干部和群众基础。

关于作者和本文

孙子鸣（1897—1962），绍兴越南区双溪乡磊儒林村人。旧制师范讲习所毕业，担任小学教师三十余年，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约五年，在日寇侵占余姚

时失业两年半。1916年2月到1920年七月，在余杭、绍兴等地做教师；1920年八月，在杭州农事试验场种藕科工作了两个月，因病回家；1921年2月到1926年八月，在余姚四门承志、马家路润德、浒山三山等小学任教师，为闹加薪风潮被人控告，被迫离开余姚，迁居杭州亲戚处，迫于生活，投入军队充当文书上士；1927年随军到湖北，同年下半年到北京（打张宗昌），因病在北京休息了半年，并因看不惯军阀行为，请长假回到余姚，继续做教师，1928年2月到1937年七月，任李氏小学校长、县立一小教师及私立启文小学校长等职；1937年八月到1939年一月，离开教师岗位，参加抗日自卫工作，与郭静唐同志等组织余姚政工队；1939年二月到1941年三月，余姚政工队被迫改组，就任教育科义教视导员，不久又一次被迫离开余姚，日寇侵占余姚后，困守启文小学，在杜村失业两年半，贫病交迫。1943年九月，应友人之邀到绍兴塘东南担任教育工作，一面抗日，一面联系四明山郭静堂同志，恢复了四明山和会稽山两地三五支队间的联络；1945年二月，在难童教养所任教导，抗战胜利后，到绍兴接办育儿所，直到1946年八月；1946年九月到1949年余姚解放，经杜天霖先生介绍回余姚鸚山，担任培民小学校长；1950年到1952年，先后任县立水阁周小学校长、泗门区中心校校长、城北区中心校校长等职，1952年下半年至1956年三月，因病留任城北中心校教师，期间修养两年多，1956年四月至1957年八月，先后在余姚机关校、县立二中、横河中学、陆埠小学、慈城职工业余学校等任教，因病提前退休（录自1958年11月22日《自愿参加政协余姚县委员会社会人士学习小组的学员简历表》），1962年病故。（据1979年5月30日《知识分子基本情况调查表》）

孙子鸣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市多地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加入政协社会人士学习小组，参政议政。

《余姚政工队的组织情况与活动情况》是孙子鸣先生于1959年12月20日撰写的回忆录。作为余姚县政工队本部干事长，孙子鸣先生经历了余姚县政工队从1938年3月筹备成立到1940年9月被迫解散的全过程，他在这篇的回忆录中，对余姚政工队成立的历史背景、组织机构、人员分工与活动开展情况都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文后附录的余姚县政工队名单包括本部组织9名、区队组织6名、其他队员68名，共计83名，这个几乎包括了政工队全体人员的名册，还为我们注

明了作者本人所掌握的每个政工队员的当年职别、政治情况、活动地点、解放后的工作单位生活城市及关于人物背景问题的备注等详细的信息，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抗战时期余姚县政工队历史的珍贵历史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利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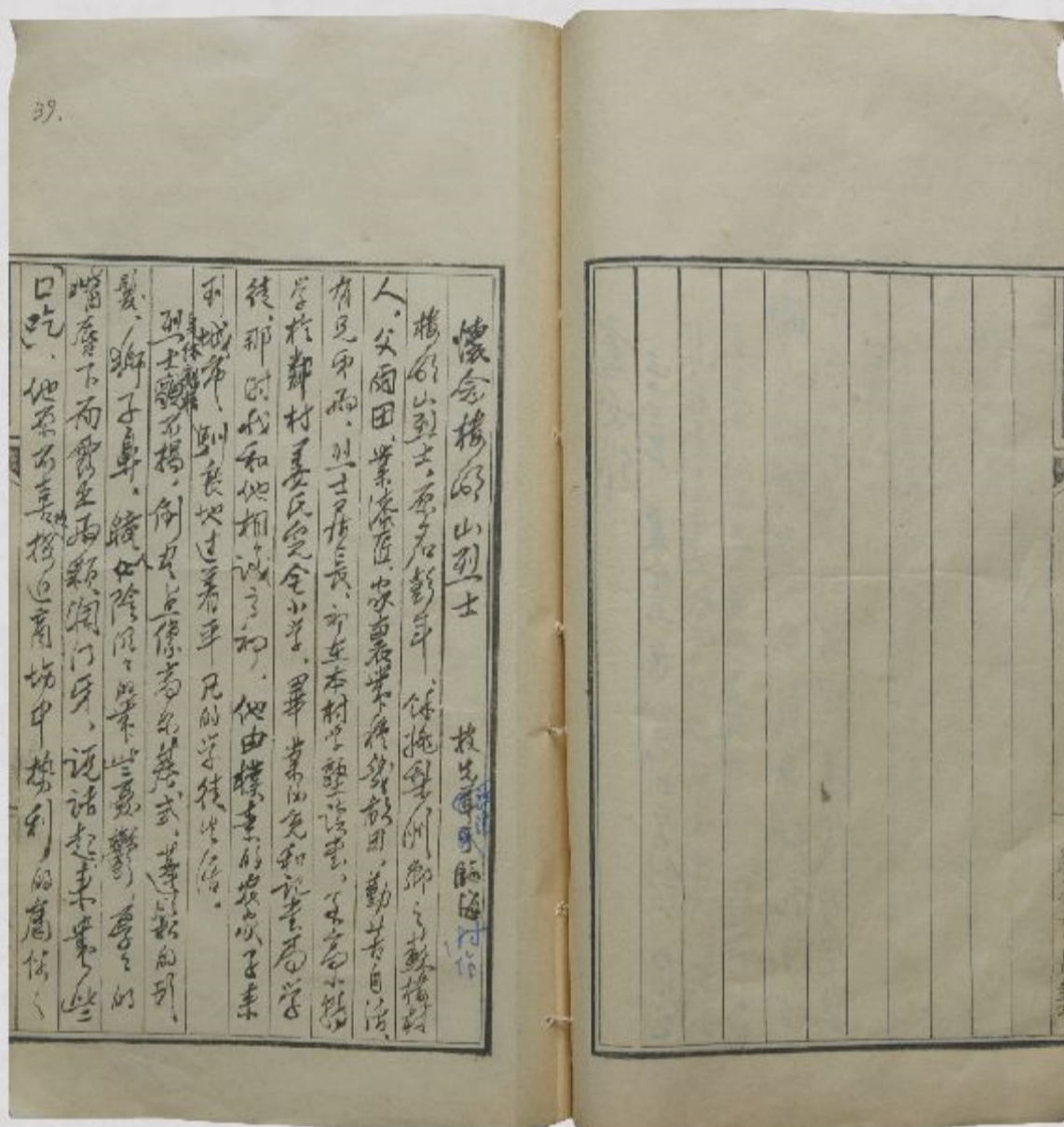
释读 王巨明

第四部分 烈士传略

导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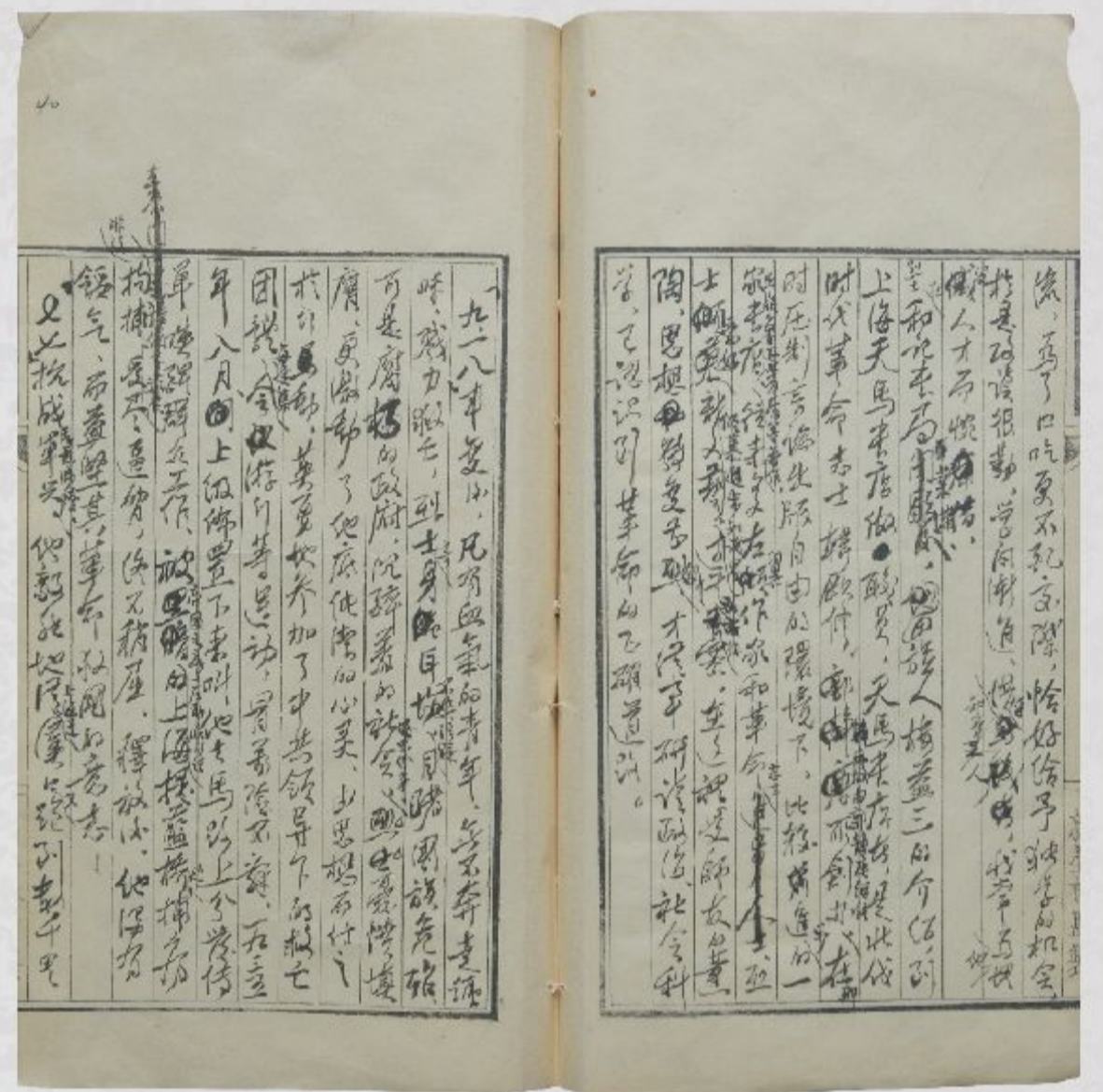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1941年5月至9月，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浙东战略基地的部署”，派遣浦东抗日武装900余人，南渡杭州湾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4月，浙东抗日军民解放梁弄后，浙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浙东行政公署进驻梁弄。以四明山为根据地，以梁弄为指挥中心，经历大小战斗643次，建立地级政权四个，解放同胞400万人，1000余名指战员英勇献身，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远成为激励后人为实现中华复兴之中国梦而不断努力。余姚档案馆馆藏的两份珍贵史料：其一、姜枝先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流亡时期所作的《赘余偶笔》之十二《怀念楼明山烈士》；其二、张光于1975年5月28日向浙江省委提供的《八位烈士名单及简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余姚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一段真实历史。从史料中所记述的楼明山、王益生、陈竹青、竺永惠、黄振汉、朱敬之、赵文翰、卢中伟、张雪生等烈士事迹，有的死于日本侵略者枪口，有的死于敌伪顽之手，他们都是为抗日而壮烈牺牲的英雄。正是因为他们的浴血奋战，才换来抗战的胜利。让我们永远缅怀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一、姜枝先：怀念楼明山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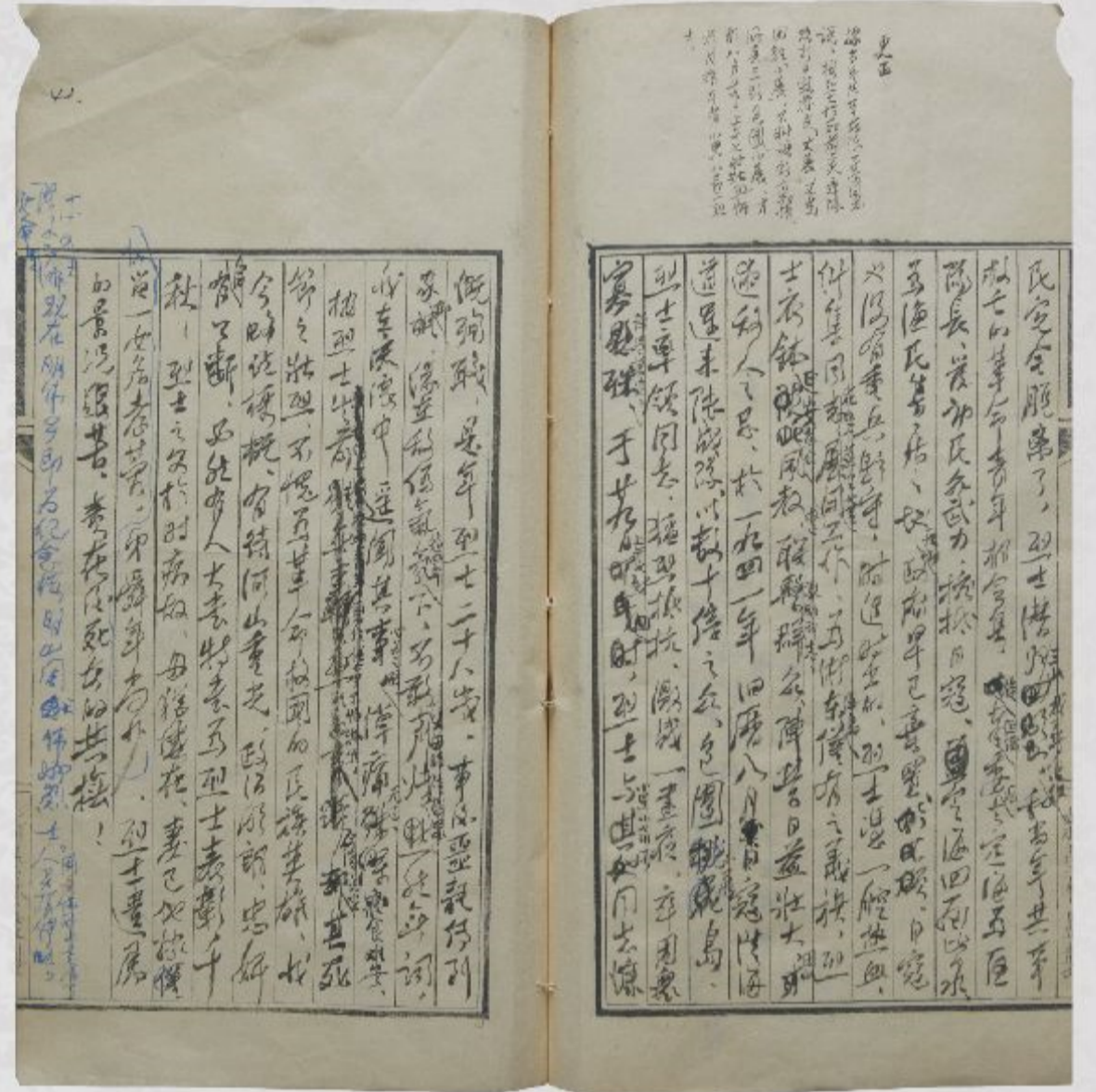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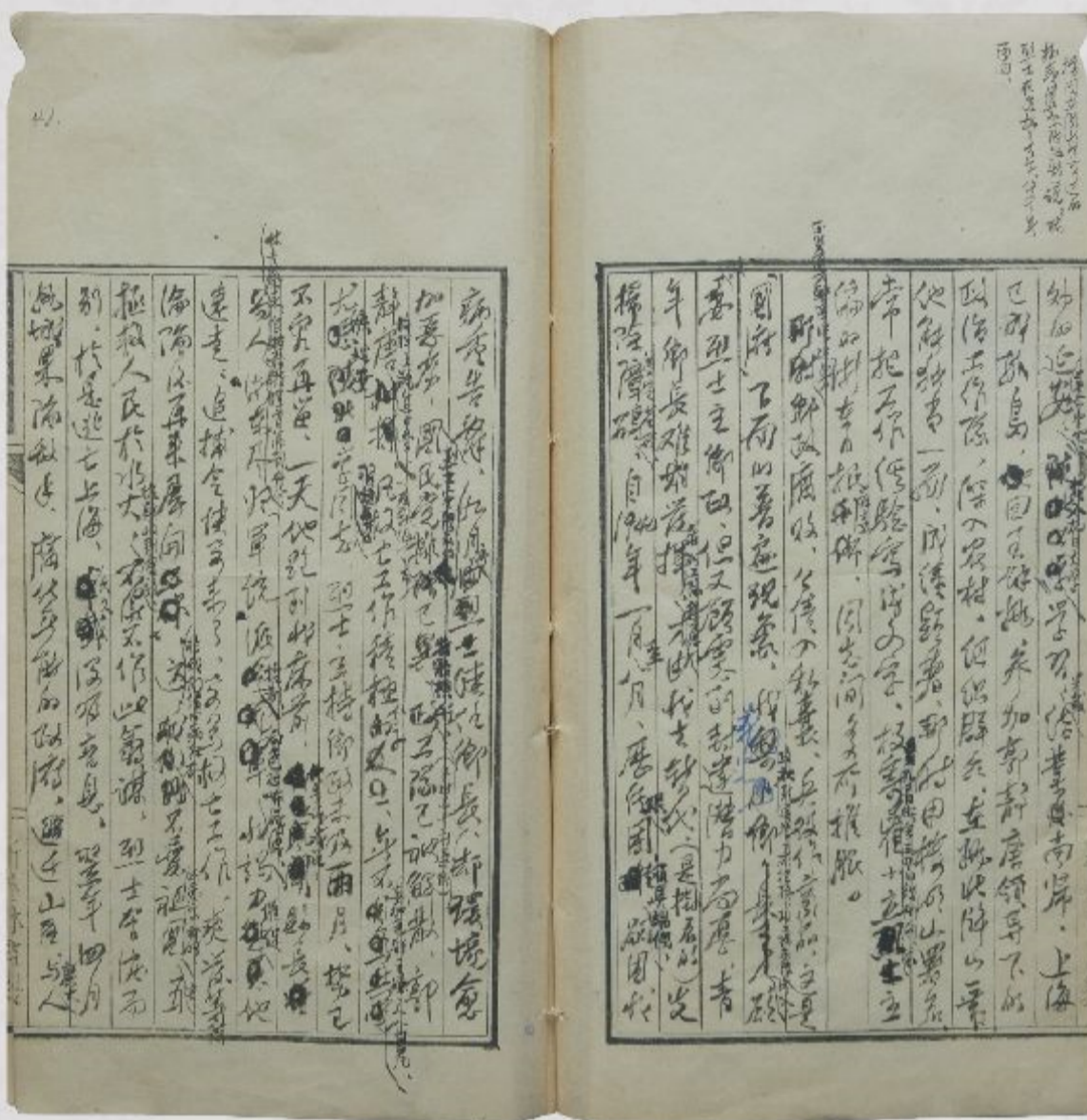


第一页

原件尺寸：287×273mm
 档案编号：232-1-68-1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第二页、第三页



释文

怀念楼明山烈士

枝先流浪临海时作

楼明山烈士，原名彭年，余姚梨州乡之苏楼村人。父雨田，业漆匠，家里常种几亩田，勤苦自活。有兄弟俩，烈士居长。初在本村学熟读书，至高小转学于邻村姜氏完全小学，毕业后充和记书局学徒。那时我和他相识之初，他由朴素的农家子来到城市，驯良地过着平凡的学徒生活。

烈士身体魁梧貌不扬，倒有点像高尔基式蓬松的头发，狮子鼻，瞳人阴沉的带些忧郁，厚厚的嘴唇下面露出两颗阔门牙，说话起来带些“口吃”。他原不喜欢接近商场中势利的庸俗之流，为了口吃更不配交际，恰好给予独学的机会，于是攻读很勤，学问渐进，惜乎知音乏人，我常为他埋没人才而惋惜。

烈士在和记书局结业满后，由他族人楼益三的介绍，到上海天马书店作职员。天马书店者，是北伐时代革命志士韩厥修^[1]所创办，韩病故，由郭静唐继任。在那时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环境下，比较进步的一家书店，出版鲁迅、茅盾等著作，往来多左翼作家和革命志士。烈士爱好新文艺，倾慕进步知识界，过从较密。在这里，受师友的熏陶，思想转变甚剧，才从事研读政治、社会科学，已认识到革命的正确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凡有血气的青年，无不奔走号呼，戮力救亡，烈士寄身洋场，不染浮躁，目睹国族危殆，可是腐朽的政府，沉醉着的社会逐末纷争。烈士忧愤填膺，更激动了他底纯洁的心灵，由思想而付之于行动，英勇地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救亡团体。每逢集会游行等运动，冒万险不辞。一九三五年八月，上级布置下来叫他去马路上分发传单，唤醒群众工作，被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勾结的上海提篮桥巡捕房非法拘捕，受尽逼胁，终不稍屈。释放后，他没有馁气，而益坚其革命救国的意志。

七七抗战军兴，民气沸腾，他毅然地从上海至汉口又跑到数千里外的延安革命圣地，投入抗日大学学习，半载结业南归。上海已成孤岛，回至余姚，参加郭静唐领导下的政治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在姚北浒山一带他能独当一面，成绩显著。那时用楼明山署名，常把工作经验写成文字，投寄抗日自

卫会主办的战斗刊和崔小立^[2]主编的浙东日报发表，同志间多所折服。

正当前方战争紧迫，后方乡政腐败，公债入私囊，兵役作商品，这是“国府”当局下面的普遍现象。我新汇乡政被封建势力所把持，政工队无法渗入，欲改委烈士主乡政，但又顾虑封建潜力尚厚，青年乡长难期发挥，在政工队怂恿下才由我去暂代（是挂名的），先扫除障碍，奠定基础。自一九四〇年一月至八月，历经艰困，稍具端倪，嗣因我病重告辞。烈士实践前约九月初，继任乡长（当时还是新汇乡）。却环境愈加恶劣，国民党反动派排斥已异，特务横行，政工队已被解散，郭静唐拘押上饶集中营，凡救亡工作积极分子，无不妄加色彩之嫌，人人自危，尤嫉延安学习归来同志。烈士主持乡政以未及两月，势已不容再留。一天，他跑到我床前，他告诉我说：县长易人，林去蔡来^[3]，自特务指挥官翁到任后，浙东尽归“军统”派系控制，白色恐怖笼罩。我竭力催促他速走：追捕令快要来了，要为救亡工作，爽发等待沦陷后再来展开。这非我们丧心病狂而不爱祖国、不爱家乡啊，实为拯救人民于水火，抗战收到实效，不得不作此筹谋。烈士含泪而别，于是逃亡上海，久久没有音息。翌年四月，姚城果陷敌手，腐化无能的政府，避迁山区，与广大人民完全脱离了。烈士潜归三北^[4]找寻组织，和当年共事救亡的革命青年相会集。旋奉组织委派去定海为区队长，发动民众武力，抵抗日寇。定海四面皆水，为渔民集居之地，反动政府早已弃置，日寇也没有重兵驻守，时进时出的。烈士凭一腔热血，纠集同志在这个蒸（真）空地带展开工作，为浙东海岛仅有之义旗。烈士衣钵延安革命风教，联系群众，激励斗志，阵营日益壮大。因此，遭敌人之忌，于一九四一年旧历八月，日寇从海道运来陆战队，以数十倍之众，包围小展岛。烈士率领同志，猛烈抵抗，激战一昼夜，卒因众寡悬殊，弹尽援绝，于廿九日上午七时，烈士与小黑、小翁两同志慷慨殉职，是年烈士二十八岁。事后噩耗传到家乡，缘在敌伪气氛笼罩下，不敢声张，父母暗泣，群众默然无词，我在流浪中遥闻其事，心为之碎，悼痛无已，寝食难安。

按烈士生前勇于任事，不怕牺牲，今复证实其死节之壮烈，不愧为革命救国的民族英雄。我今略志梗概，有待河山重光，政治明朗，忠奸自有公断，必然有人大书特书，为烈士表彰千秋。烈士之父于时病故，母犹健在，妻已他嫁，仅留一女名孝蓉，弟舜年尚少。烈士遗属的景况艰苦，责在后死者的共